

皖南事变及其历史教训

杨 荣

1941年1月,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,翻开中国革命史上这沉重的一页,回顾这段悲壮的历史,我们应永远铭记这鲜血凝成的历史教训。本文从皖南事变爆发的原因、过程及其应吸取的教训方面作一些探讨,以求教于同行。

蒋介石阴谋发动皖南事变,是其推行反动政策的必然结果。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执行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、坚持华中抗战的人民军队。抗战爆发后,我党以民族大义为重,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,暂时作出某些重大让步,经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,将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和红28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(简称新四军),开赴华中抗战前线,积极打击日伪、收复国土,很快建立了大片巩固的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,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抗日武装力量。然而,在1939年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,却制定了《限制异党活动办法》,采取一系列反共措施。对此,中共中央明确表示:“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。但是,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,如果欺人太甚,如实行压迫,那末,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。这态度就是: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;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”。^①由于中共执行有

理有利有节的反磨擦方针,击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。但国民党又将斗争矛头由华北移向华中,由进攻八路军转向进攻新四军。1940年3月至6月,蒋介石一再命令新四军“江北部队全数移至江南”。^②1940年秋冬之际,蒋介石指使何应钦、白崇禧两次致电朱德、彭德怀、叶挺、项英(即《皓电》、《齐电》)限八路军、新四军一个月内全部开至黄河以北。同时又从苏南、浙东、赣东抽出装备较好、战斗力较强的40师、79师、146师开进皖南,专门对付新四军。^③又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增至20万人。

面对如此严重局势,中共中央紧张而又慎重地研究对策。中共中央11月9日以朱、彭、叶、项名义发表佳电,坚决拒绝国民党要八路军、新四军限期撤到黄河以北的命令,为顾全大局,允许将皖南新四军北移。12月10日,蒋介石密令顾祝同“妥为部署”,“至限期(12月31日)该军仍不遵令北渡,应立即将其解决,勿再宽容”。^④12月25日圣诞之夜,蒋介石一反常态,突然召见周恩来,蒋以极具感情的神情说话:“我难道愿意内战吗?愿意弄坍台吗?现在八路军、新四军不都是我的部下?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?”蒋的表白意味着他已操刀在手,随时可以置共产党人于血泊之中。周恩来立即电告中央,指出蒋“吓压之余,又加上哄之一着了”,“其局部的‘剿共’仍

在加紧布置中”。^⑤毛泽东从周恩来的洞察中意识到皖南部队处境险恶，即刻发电严令项英，丢掉幻想，马上北移。然而，时机已失，为时已晚，国民党顽固派的“围剿”部署已完全就绪。由此可见，国民党顽固派是制造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。他们制造皖南事变，只是实施限共、灭共计划的一部分。

二

1941年1月4日，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分共9000余人，由皖涇县北岭一带出发北移，因遇大雨，部队于5日下午方到达指定位置。6日下午，北移部队继续向星潭方向前进，即与国民党部队遭遇，发生交火。7日起，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所属32军集团军上官云相等部七个师八万多人，在蒋介石“一网打尽，生擒叶项”的密令下，向新四军发起攻击。面对国民党军队早有预谋的进攻，新四军被迫奋起自卫，继续向星潭开进，但遭拦击，前进受阻，后改变计划向西南太平方向行动又遭阻击，折向西北，更遇强敌，至1月10日，各部队均陷入重围，被迫退到石井坑坚守。为挽救危局，保全部队，军长叶挺致书上官云相，责其背信弃义，并表示愿往上官总部协商。13日，叶挺到上官处被扣押。14日，国民党军队猛攻，新四军多次击退敌军进攻。在阵地上，有的伤员躺着扔手榴弹，有的赤手空拳搏斗，有的用仅剩的一条腿靠着墙支撑着身体，用拐棍对付敌人，来一个打一个，展现了新四军指战员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。面对数十倍于我的优势强敌，石井坑余部奋战至14日，终于弹尽粮绝，阵地全部失守。全军除约2000人突出重围，大部壮烈牺牲。副军长项英、副参谋长周予昆突围后遭叛徒杀害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遇难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。1月17日晚，国民党中央社发布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通令和发言人谈话，反诬新

四军叛变，取消新四军番号，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。这样，就把国民党的这次反共高潮推到了顶点。

事变发生后，周恩来为了揭露这一严重事件的真相，在1月18日《新华日报》“开天窗”的位置上，加印上亲笔撰写的题词和诗句：“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！千古奇冤，江南一叶，同室操戈，相煎何急？！”

三

皖南事变给我党我军提供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深刻的。首先对蒋介石估计不足，没有坚持南进。中共的局部让步，国民党却步步进逼。1940年10月9日，何应钦、白崇禧联名发出《皓电》后，中共中央将其视作第二次国共合作即将破裂的信号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。11月3日，毛泽东一日之内给彭德怀、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项英分别发出四电，提出了延安我党的计划。在致项英电中，毛泽东提出“何应钦、白崇禧《皓电》，中央决定用朱、彭、叶、项的名义答复，采取缓和态度，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。对皖南方面，决定让步，答应北移”。^⑥11月9日，中共中央以朱、彭、叶、项名义发出《佳电》，作为对《皓电》的答复。在电文中，决定将皖南新四军移至江北。国民党视《佳电》为向其示弱，加紧布置剿灭新四军的计划。12月8日，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对皖南新四军的讨伐令。顾祝同令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担任前线总指挥，上官云相迅速制定了进剿计划。他声称：“我的作战要旨是：如果新四军不遵令于年底以前渡江，决以优势兵力加以包围消灭”。^⑦这是一场有计划、有准备、有步骤、蓄谋已久、精心策划的阴谋，无论新四军走与不走，也无论走哪条路线，都要遭到“围剿”。项英思想麻痹，对蒋介石要消灭新四军的阴谋认识不足，是造成延误北移，惨遭剧变的重要原因。

其次，在任何时候决不能放松党对人

民军队的绝对领导。早在10月8日,毛泽东等即指示新四军军部应“迅速渡江,以皖东为根据地,绝对不要再迟疑。”^①11日项英复电说“北移困难”,坚持“仍以军部所在地作基点较有利”的意见。^②12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,坚持要军部北移,“皖南战斗部队,亦当一部北移,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”。^③对此,项英表示异议,在实际行动中限制部队的发展,军部滞留皖南,对国民党无理要求一再迁就退让。项英对叶挺不尊重,使叶无法工作。《皓电》发表后,中央决定皖南部队北移,11月3日去电征求叶、项意见,项英才同意新四军北移。项英本来对北移就迟凝不决,后来虽表示遵命北移,但从11月15日到12月25日的40天里,项英仍不做北移准备,行动犹豫。由于项英不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移的决定,一拖再拖,坐失了在国民党“围剿”部署前的北移时机,客观上为国民党创造了以求全歼的条件。

再者,项英的军事指挥错误,也是造成皖事事变惨局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其一,在敌我力量判断上,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不足,又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,“以为可以用和平交涉的方法通过”。^④“认为即使与敌发生战斗时,我亦可很快将敌消灭或击溃”。^⑤结果,陷入了敌人的重围,造成全军覆没。其二,选择走南线,钻进了顽固派预设的包围圈。南线的国民党军队40师是皖南8个师最强者,而且严阵以待。走南线,就钻进了敌人的口袋底,很快被四面包

围;加之地形不熟,敌情不明,很难突围。其三,临阵指挥失误,使部队损失进一步加重。北移出发后,星潭受阻,项英手足无措,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,还开了7个小时的会议,白白地坐失良机,挫伤了士气。最后,项英决定后撤返回丕岭以西,而叶挺军长主张攻下星潭,突出包围圈的意见没有得到支持。

最后,项英在危急关头,擅自离队,动摇军心;归队后又消极悲观,不及时组织部队突围,分散游击,坐等敌人收紧包围圈,进行总攻。

皖南事变,是中国革命史上沉痛壮烈的一页,其留给后人深刻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记取,先烈们用自己的鲜血写下的壮丽人生诗篇,永远昭示着现代人努力进取,图强奋发。

注释:

- ① 《毛泽东选集》合订本,第553页。
- ② 1940年3月25日,蒋介石致顾祝同电。
- ③ 岳星明:《皖南事变亲身经历的回忆》。
- ④ 《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》三辑15册。
- ⑤ 《皖南事变》,第122页。
- ⑥ 中央档案馆《皖南事变〈资料选辑〉》,第139页。
- ⑦ 武之莱:《上官云相袭击新四军的经过》,全国《文史资料选辑》第57辑。
- ⑧⑨⑩ 《皖南事变》,第63、64、65页。
- ⑪ 陈毅:《皖南事变总结》。
- ⑫ 《皖南事变要报》。